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 形成机制研究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Classifiers:
A Typological Approach

李计伟 著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类型学视野下 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ese
Classifiers: A Typological Approach

李计伟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李计伟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2884-1

I. ①类… II. ①李… III. ①汉语—数量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727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LÈIXÍNGXUÉ SHÌYĚ XIA
HÀNYŮ MÍNGLIÀNGCÍ XÍNGCHÉNG JĪZHÌ YÁNJIŪ
类型学视野下汉语名量词形成机制研究

李计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884-1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1/4

定价:4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这本书的底稿是计伟的博士学位论文。经过五六年的修改,争取到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就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希望我写个序。

计伟是我的博士,我自然是非常乐意为之。可是,五六年过去了,对论文中的内容已经有些记忆模糊了,就让计伟寄了一份新稿来。空暇时翻看纸本,感觉很奇妙。也许,指导论文时紧张忙乱,注意力又放在了大的框架和理论论述是否合理上,没有细细体味例句,所以这份奇妙那时没有体会到。闲暇时看,细细地品,感觉真像是穿越时空回到中古,重新从时间隧道中走过,听不同时期的古人说话,有说农事的,有谈政务的,有吟诗拍曲的,还有讲各种新闻轶事的。时间隧道上一路听过来,几个原来的名词动词变成了各有自己特点的名量词。每个名量词产生的过程那么地不同:有的涉及字形不同、义项有交叉的另一个同音字(窠/科),有的是根据字义利用形声原理另造了新字(棵);有的在其名词阶段的所指到量词阶段已经不是外显可视特征(如“根:两根长竿/几根头发”),并且在其演变为量词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语义重塑(如“根”所分类的长条状物,既可以是如树般“硬而直”的,也可以是像草般“软而曲”的);还有从动词来的名量词、从并列结构的双音词来的名量词等等;个个都是那么有趣。还有,一些量词现在的意义和搭配,经计伟细细地剖析,才发现其中的肯綮,比如“一副球拍”通常是两只相同的球拍,“一副手套”是花色/质料/大小/肥瘦相同但拇指方向相反的两只,“一副口罩”又是两根绳子和一片纱布加工成一体的“一个”,那么,什么是“一副”?计伟给你分解。所引例句“政和中大雉,下桂府进面具。比进到,称‘一副’,初讶其少。乃是以八百枚为一副,老少妍陋无一相似者,乃大惊。”用来体会什么叫“一副”,令人拍案称绝。

至于最后的理论总结,当然也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创新,倒没怎么感动我。总觉得,以前好像界限还比较分明的“隐喻”和“转喻”,现在的国外学者,都称之为“隐喻”的有之,都称之为“转喻”的也有之,区分两者但定义和界限与传统不同的也有之。此种种不同的理论,在各自的框架中似均可“自

洽”；但终不及论文讨论的特点分明的个案，个个有大量不同历史时期语料，有独具只眼的剖析，读来更加有趣。

计伟来读博士之前，已在高校工作，参加其他老师的项目研究量词也有几年了，我则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一研究。为什么会收他做博士呢？实际上，计伟报考的是陈保亚老师，考的成绩相当不错。可是，保亚老师有另外两位报考者考得更好，且研究方向与老师一致。我呢，有一位研究方向与我相同的报考者，成绩比计伟稍差一点点。按照规定，他们三位肯定能入选，而计伟要落选。我感到这个结果不够公平，恐怕会影响到外校考生报考的积极性。于是我和保亚两人商量决定，问问计伟是否愿意调剂到我这边，这样这四位报考者就可以都上来——计伟同意了。

说来惭愧，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计伟在读四年中几乎对他没有任何的指导。好在，我们教研室的董秀芳老师在这一方面颇为内行，给了计伟不少帮助。好在，计伟勤奋，自己十分努力。除了入学前的积累，博士期间又尽量多地阅读国内外文献，利用更多的语料库分析更多的名量词，写出不少新的研究成果。他临近毕业时，我听我的一位从语言对比和二语习得的角度做“把字句”研究的韩国博士生说，当她需要中国学生帮助修改论文时，计伟是最认真、帮忙最多的。这使得我对计伟又有了新的认识。那时我就相信，以他的勤奋和无私，毕业后一定会有好的发展。

果然，博士毕业来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后，计伟积极参加郭熙教授有关东南亚华语的课题，在进一步开拓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研究视野和能力都大有提高。这方面的新成果，计伟也多次与我分享。感谢计伟不断带给我的惊喜！

王洪君

2016年7月22日于北大承泽园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量词、类别词与单位词	2
1.1.1 汉语的量词及其分类	2
1.1.2 类型学视野下的类别词及其分类	6
1.1.3 术语	13
1.2 汉语名量词的语法化研究综述	14
1.2.1 汉语名量词范畴的语法化	15
1.2.2 名量词语法化过程的个案研究	16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框架	20
1.3.1 研究目标	20
1.3.2 研究框架	20
1.4 理论基础和语料来源	21
1.4.1 理论基础	21
1.4.2 语料来源	23
第二章 名词来源的名量词	24
2.1 量词“窠”的产生、发展与量词“棵”的出现	25
2.1.1 问题的提出	25
2.1.2 “窠”的本义、隐喻意义及量词“窠 ₁ ”的产生	26
2.1.3 量词“窠 ₃ ”及其组配	30
2.1.4 量词“窠 ₂ ”的产生及其逆语法化	32
2.1.5 量词“棵”的出现及其与“窠 ₂ ”的关系	37
2.1.6 基于“窠”来重建“科”的语义发展过程	39
2.1.7 结语	44
2.2 量词“根”的语法化与其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	45
2.2.1 问题的提出	45
2.2.2 量词“根”的形成	46
2.2.3 范畴化理论与量词“根”认知语义的多向发展	49
2.2.4 关于汉语量词的功能	55

2.3	量词“桩”的语法化与其句法组配的发展	56
2.3.1	问题的提出	56
2.3.2	“桩”的内涵意义与量词“桩”的产生	58
2.3.3	量词“桩”的发展与其句法组配	61
2.4	量词“则”的来源与其句法组配	68
2.4.1	问题的提出	68
2.4.2	量词“则”的来源	69
2.4.3	量词“则”的句法组配	72
2.5	本章小结	73
第三章	动词来源的名量词	75
3.1	量词“副”的语法化与其义项分立	75
3.1.1	问题的提出	75
3.1.2	“副”的动词意义与量词“副”的认知语义基础	76
3.1.3	量词“副”的句法组配及相关问题的解释	78
3.1.4	结语	86
3.2	量词“件”的语法化与其句法组配	89
3.2.1	问题的提出	89
3.2.2	量词“件”的认知语义基础	90
3.2.3	量词“件”的句法组配	95
3.3	量词“把”的语法化与其句法组配	100
3.3.1	问题的提出	100
3.3.2	“把 ₂ ”的出现与其句法组配	101
3.3.3	“把 ₁ ”的出现与其句法组配	105
3.3.4	“把 ₃ ”的出现与其句法组配	108
3.3.5	粤方言中的“(一)把嘴/口”及相关问题	109
3.4	量词“屈”的语法化	118
3.4.1	动词“屈”的意义	118
3.4.2	量词“屈”的产生与其句法组配	119
3.5	本章小结	122
第四章	复杂来源的名量词	124
4.1	量词“项”的来源与其句法组配	124
4.1.1	问题的提出	124
4.1.2	量词“项”的复杂来源:从“头项”到“项”	125
4.1.3	“头项”的词汇化、意义及其省缩为“项”的原因	127
4.1.4	量词“项”的语义特征及其句法组配	132
4.1.5	海外华语中量词“项”的组配	137
4.1.6	结语	140

4.2 量词“叶”的多元生成与量词“页”的来源	140
4.2.1 问题的提出	140
4.2.2 量词“叶 ₁ ”的产生与其句法组配	141
4.2.3 量词“叶 ₂ ”的产生与其句法组配	143
4.2.4 量词“叶 ₃ ”的产生与量词“页”的出现	145
4.3 本章小结	153
第五章 汉语名量词的转喻生成与隐喻-转喻扩展	154
5.1 转喻理论与汉语名量词的转喻生成	154
5.1.1 名词的可数性与汉语光杆名词的指称功能	154
5.1.2 Radden & Kövecses 的转喻理论	158
5.1.3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的起源及其历史层次	162
5.1.4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的转喻生成	163
5.2 隐喻理论与汉语名量词的隐喻-转喻扩展	178
5.2.1 隐喻理论	178
5.2.2 汉藏语系语言名量词的隐喻扩展	179
5.3 从转喻生成与隐喻-转喻扩展看名词量词的双向选择	184
5.3.1 汉语名词量词的双向选择机制	185
5.3.2 汉语名词量词双向选择机制的成因	186
5.4 本章小结	187
第六章 汉语“名+量”式双音词研究	189
6.1 “名+量”式双音词的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189
6.2 “名+量”式双音词的形成	191
6.2.1 “N件”	192
6.2.2 “事条”	202
6.2.3 “N只”	204
6.2.4 “N匹”及其他“名+量”式双音词	206
6.3 “名+量”式双音词结构平议	208
6.4 “名+量”式双音词的析层与来源方式分类	212
6.4.1 原生式“名+量”式双音词的判定标准	213
6.4.2 “官员”和“书本”	215
6.5 本章小结	217
第七章 结论	219
参考文献	221
引用书目	228
后记	229

第一章 绪论

英国语言学家 Lyons(1977:460)曾针对其当时的语言学研究状况指出,相对于指示词(determiner)和量化词(quantifier),语义学家很少关注“量词(classifiers)”这类词,因为大家最为熟悉的印欧语言没有这一类词。^①近些年来,随着语言类型学的兴起与日趋繁荣,“量词”逐渐进入西方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并成为热点问题。而在以汉语为主要代表的汉藏语系中,由于量词有着较为广泛的使用,具有量词也因此被认为是汉语乃至整个汉藏语系的一个特点,并得到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刘丹青(2011、2012)从语言库藏类型学的视角,将量词视为汉语尤其是汉语南方方言的显赫词类。

在语言学文献中,classifiers 有“量词”“类别词(或分类词,下文除直接引文以外,均使用前者)”和“单位词”等不同的汉语对应名称,对这些术语之名实的争论时有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从对这些名称的评述出发,开始我们的研究。

① 我们知道,在中西语言文化的交流史上,欧洲的传教士可谓是汉语传播到欧洲的开路先锋和头号功臣。印欧语言没有“量词”,但是汉语有,所以在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欧洲人所编撰的汉语教材、词典和汉语研究著作中,很多都提及了“量词”,当然,他们对“量词”的认识和命名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如 1813 年出版的由法国人德经(Chretien-Louis 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主编的《汉-法-拉丁语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cais et latin)中,其附录部分就有一张含有 92 个“量词(caractères numeriques)”的词表。再如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在其 1815 年出版的《通用汉语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指出,在汉语中,要把量词放在名词之前表示名词的数量。卡萨齐、莎丽达(2011:123)指出,马礼逊似乎是到当时为止第一个把量词从助词中分出来的学者。1845 年,法国东方语言大学教授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在其《汉语常用语语法回忆录》中用很大篇幅谈论汉语的量词;巴赞说:“在口语中,一个中国话里的名词前边一般有符合自己的量词。我把这些量词称作 spécifiques,相反地,德经和 Abel-Rémusat 错误地分别把它们叫作 caractères numeriques 和 particules numérales。今日的英国人给它们起了 the classifiers 这个名词。”本书对量词的英文翻译采用现在广为使用的 classifiers。

1.1 量词、类别词与单位词

1.1.1 汉语的量词及其分类

关于汉语的量词,有一些基本的问题还尚未取得一致或明确的看法。比如:量词包括哪些次类?“量词”这个术语与其所指是否名副其实?汉语这种语言为什么会有量词这个范畴?它又是如何产生的?等等。作为本项研究的知识背景和起点,在这里,我们想首先简单梳理一下汉语量词这个词类范畴确立的历程及其分类情况。

出版于1898年的《马氏文通》,是中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语法学著作。在这部书中,“量词”这个范畴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字类(即词类),作者马建忠也未明言它属于哪个字类。不过从马建忠的叙述中不难看出,“量词”这个范畴应该是属于“名字”的一个次类。马建忠是在论述“所以肖事物之形者”的“静字”的时候提到“量词”这个范畴的。静字就是今天所说的形容词。^①“静字”又分为两类:“曰象静,曰滋静。象静者,以言事物之如何也,滋静者,以言事物之几何也。曰如何,曰几何,皆形之显著者也。”(1983:111—112)“数词”属于“滋静”。马氏说:“[数]非表词而后者,必所数者可不言而喻。故凡物之公名有别称以记数者,如车乘马匹之类,必先之。”(1983:122)马氏还举例说:“韩《平淮西碑》:‘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单记数者,犹云‘大战十六次,得栅城县二十三处,降人卒四万名’。皆可不言而喻。曰‘次’曰‘处’曰‘名’者,即所谓记数之别称也。”“《史记·滑稽列传》:‘于是齐威王乃益赏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曰‘镒’曰‘双’曰‘驷’,皆物之别称,所以记数也。”(1983:123)从“量词”是“所谓记数之别称”和“物之别称”可以得知,马建忠是把它归入“名字”的^②。“所以记数”即“用来记数的东西”,如此看来,马建忠

① 宋绍年(2004:107)说:“《文通》的静字可以对应后代的形容词,但是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别。主要差别有两个,一是《文通》把状态形容词,即复杂形式的形容词,排除在静字之外,归入了状字。表示性质的形容词《文通》称为象静。二是《文通》把数词归入了静字,称为滋静。……马氏将上古汉语的数词归入形容词是很有见地的,因为在上古汉语里,作谓语是数词的基本语法功能之一,而中古以后数词一般不再单独作谓语,……”

② 朱自清在给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写的“序”里说:“向来只将这种词[笔者注:这种词指量词]附在名词里,他[笔者注:指陆志韦]却将它和‘代名词’‘数名词’同列在‘指代词’一类里。这种词的作用和性质这才显明。”陆志韦主编的《国语单音词词汇》之前的语法著作主要是《马氏文通》和《新著国语法》,无疑,作为中国最早也最有名的语法学著作的《马氏文通》应该是属于“向来”之内的,也即朱自清先生认为《马氏文通》是把“量词”归在名词之下的。

也是把今天所谓的“量词”看作是计数单位的。

就笔者所见,“量词”这个术语最早见于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该书初版于1924年,是中国早期白话文语法的代表性著作。在《新著国语文法》中,量词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同马建忠一样,黎锦熙也把“量词”看作是“名词”的一个次类:“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可再分为三项:(ㄅ)即用一种个体的普通名词来表他物的数量,如‘碗’‘桶’‘包’等,可以作‘水’‘油’‘面粉’的量词,而成为‘一杯水’或‘水一杯’等。(ㄆ)有一种专表数量的名称,就是一切度、量、衡,如‘尺’‘寸’‘升’‘斗’‘斤’‘两’等。(ㄇ)更有一种量词,既非物体,又非专称,大都是从名词转变而成为形容词性质的,如‘个’‘只’‘朵’‘棵’^①‘匹’等。”(1992:84—85)

1924年才提出的“量词”这个术语,到1943年朱自清先生为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②作序的时候,已经成了“旧称”。朱自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陆先生(笔者注:陆先生指陆志韦)特别看重所谓助名词——旧称‘量词’,本书叫作‘称数法’——,认为‘汉缅语’的特征。”对于朱自清的这句话,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王力先生并不是把今天所谓的“量词”称为“称数法”,而是把汉语对事物进行称数时必须用数词加量词这种方式称为“称数法”。在该书中,王力先生认为今天所说的量词是名词之一种,称之为单位名词。王力先生一直坚持使用“单位词”这个术语,并认为单位词属于名词,不过他后来也接受了“量词”和“类别词”的说法,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汉语语法史》中说:“单位词是名词的一种,它表示人物的单位,经常和数目字一起用,所以又叫做‘量词’。不同类的事物有不同的单位词,所以又叫做‘类别词’(classifiers)。”(1989:24)在《汉语语法史》中,王力把单位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度量衡单位,这是一般语言都具备的,一类是天然单位,是东方语言所特有的。

与王力先生《中国现代语法》同时期出版的吕叔湘先生著的《中国文法要略》^③也称量词为“单位词”。与前边几家看法不同的是,吕先生把单位词看作是“指称词(称代词)”的一个次类,这一点与陆志韦先生《国语单音词词汇》的观点是一样的。吕先生把单位词分为如下几类:度量衡单位、借用器

① 实际上“棵”并不是直接从“棵”这个名词转变而来的,详见本书2.1的相关论述。

② 《中国现代语法》的上册初版于1943年,下册初版于1944年,后来商务印书馆在编辑出版“汉语语法丛书”时把两册合为一册。

③ 《中国文法要略》上卷1942年初版,中卷、下卷1944年初版。

物的名称、借用动词、集合性单位词、与时间有关的单位词和用于可计数之物件的单位词。吕先生说,世界上的事物,有可以计数的,有不能计数的,可以计数的,可以直接用数字来表示数量,不能计数的,如各种物质,必须凭依种种度量衡单位,或方便借用的量器,才能计数。如此,大多数用于可计数之物件的单位词,可以说是为了要有单位词而用的单位词。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吕先生的观点实际上是,不可数的物质名词需要用各种度量衡单位词才能计数,而用于可计数之事物的单位词——“为了要有单位词而用的单位词”——是由于度量衡单位词的类推而出现的。郭锐(2002)、Cheng & Sybesma(2005)和蒋颖(2009)等均持这种观点。

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初版于1948年。该书有“量词”这个名目,不过它是表示量的范畴的,类似英语的 quantitative,高先生举的例子有“皆”“各”“最”等。那些用于数目字和名词之间的词是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单位的特点。”在高先生的语法体系中,“数位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范畴。高先生把汉语的数位词分为三类,即:度量衡的单位、部分词和范词。部分词与度量衡单位词的区别就在于度量衡单位词是有一定标准和系统的,而部分词的运用是在事物的单位有赖于别的东西来衡量的情形之下才产生的,如“升”属于度量衡单位词,而“碗”则属于部分词。关于“范词”,高先生说:“范词所表示的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则是单位分明的。‘一条狗’是一个单位,这是谁也明白的,所以有的语言只说‘一狗’,然而汉语,则除了‘一狗’之外,又有‘一条狗’的说法。这里的‘条’字是把‘狗’归纳到‘条’的范围之中,表明其为‘条’类的事物。因此,我们就认此类词为范词。”(1986:168—169)可以看出,所谓“范词”,就是通过把相关名词划在一起组成一个范畴的词。高先生的“范词”对应于后文将要谈到的狭义的“数量类别词(Numeral Classifier)”。

从前边对各家观点的评述可以看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出版的汉语语法论著中,使用“量词”这一术语的只有黎锦熙一家,并且大多都认为今天所谓“量词”这么一类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词类,陆志韦先生和吕叔湘先生把它归入“指代词”,高名凯先生称之为数位词,其余各家均认为它是名词的一个次类。“量词”这个术语的大行其道及其独立词类地位的确立,是与“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推行分不开的。

制定于1956年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确立了“量词”的独立的词类地位。该系统认为“表示事物或动作的数量单位的词是量词”。在介绍“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语法和语法教学》一书中,有《数词、量词、代词》一文,该文由徐仲华执笔。该文说:“表示事物计算的单位的词类是量

词。”可以分为物量词和动量词两大类。可以看出,这两个定义以及黎锦熙先生的“量词就是表数量的名词,添加在数词之下,用来作所计数的事物之单位”这个定义,都是从“单位”的角度来定义“量词”的,那为何不选用“单位词”而选用“量词”这个术语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或许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黎锦熙、刘世儒(1978)的观点——“单位”也是“量”的范畴,且“量”字的意义更为明确。随着“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全国中学广泛地推行使用及《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1965)等语法论著的流传,“量词”这个名目就更加牢固了。

陈望道(1973)率先对“量词”这个术语发难。他认为黎锦熙把“量词”定义为“表数量的单位名称”是不妥的,是“混沌的”。他举例说,“一座桥”“一间房子”的“座”“间”,就不是表数量,而是表“桥”和“房子”的形体模样,也是表质的。到了陈望道(1978),陈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称今天所说的量词为“单位词”,认为单位词是点词(包括数词和指词)的“附类”。陈先生把单位词分为计量单位词和形体单位词两类,指出“不少文法书把这形体单位词同那计量单位词混在一起,概称为‘量词’,这是不够确切的”。

黎锦熙、刘世儒(1978)对陈望道(1973)的质疑进行了反驳,并进一步申述了“量词”的定义及其与单位词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这些都是量词(都同数量范畴有关)。不同的只是:有的表个体(如“座”“圆”等)、有的表质料(如“斗”“碗”等)、有的表集体(如“群”“打”等);计算手法不同,而其为计算则一。”(1978:5)“我们在《教材》中说‘因之也叫“单位词”’,现在明确:‘单位词’虽似不如‘量词’,但基本上没有矛盾,可以并用。因为‘单位’也是‘量’的范畴,只是没有‘量’字的意义明显而已。”(1978:13)

此后一直到目前的几十年间,学界似乎默认了“量词”这个称呼。朱德熙(1982)以及在高等院校流传最广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都采用了“量词”这个术语。

刘世儒(1965)将南北朝时期汉语的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关于名量词,则依据量词是“计数”还是“称量”,将之分为陪伴词、陪伴·称量词和称量词三类。陪伴词的作用是只陪伴名物,不核算分量,是纯然的语法范畴,同实际称量的数量没有关系。陪伴词与常说的个体量词相当。

郭锐(2002)是近年来现代汉语词类研究的集大成并且多有创获的著作。关于量词,郭锐虽然采用了“量词”这个术语,但是他认为可能用“单位词”更为合适。他说:“从语法意义上看,量词表示计量的单位或等级、编号单位。量词本身并不包含数量的意义,只有与数词结合后,数量词组整体才表示数量,因此叫‘单位词’更贴切。”(2002:201)

关于现代汉语量词的分类,郭锐认为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动量词、时量词和自主量词四类,其中名量词又可以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约定量词、度量词、成形量词、容纳量词、部分量词、种类量词、过程量词、编号量词和不定名量词等十一类。张斌主编(2010:140)将现代汉语的量词首先分为单纯量词和复合量词两种,其中单纯量词又可以分为物量词、动量词和时量词三种,同时还认为“尽管大家对物量词内部的划分不尽相同,但有几类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量度量词”。

蒋颖(2009)基于对整个汉藏语系的考察,把量词首先分为名量词和动量词两类,名量词又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度量衡量词和时间量词,其中个体量词再分为反响型量词、性状量词、种类量词、通用量词,集合量词再分为定量集合量词和不定量集合量词,度量衡量词再分为标准度量衡量词和非标准度量衡量词。

对量词的分类,徐通锵(2008:225—226)有这样一番评论:“对量字[笔者注:量字即量词]性质的不同认识自然会涉及量字分类的原则。……现在语法研究中对量字的分类缺乏统一的原则,总的倾向是主观性太强,而遵循客观事物本身提供的线索偏于薄弱,因而分类的标准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位作者,分类的原则也不统一。例如,赵元任(1968)分九类: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容器量词、临时量词、标准量词、准量词、动量词;……这里的分类标准很不统一,有的是依据量的标准分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部分量词;有的依据语义,分出容器量词、标准量词;有的是依据用法分出临时量词、准量词,等等。”杨亦鸣等(2003)通过对失语症病人的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现代汉语量词系统及其下位分类名量词和动量词具有一定的神经生理机制和心理现实性基础,而名量词和动量词内部所划分出的专用量词和借用量词两类,既没有相应的神经生理机制和心理现实性基础,也不能实现描写充分性和解释充分性的当代语言学理论要求。

量词的分类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我们后面仅仅结合量词“窠”“副”“件”“把”等来谈谈“容器量词”“个体量词”和“集合量词”的划分标准、定义及三者之间的纠葛问题。

1.1.2 类型学视野下的类别词及其分类

高名凯先生的西学背景让他对西方语言学甚是熟悉,他在《汉语语法论》中就已经提到了“类别词”。“汉语具有名词功能的词,如果加上一个数目字的话,在这词和这数目字之中就得加上一个虚词来表明这个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例如‘一本书’‘一管笔’之类。这种虚词,有的人,如戴遂良

称之为别词(*spécificatifs*),因为它的作用在于表示各事物的特别的性质。另外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则称此种虚词为类词(*classificateurs; classifiers*)。陆志韦曾提议称此等虚词为‘助名词’(adnouns)。我们认为最好称这些虚词为数位词,因为它们的作用在于辅助说明事物的单位或单位的特点。”(1986:160)在《汉语语法论》中,“数位词”分为“度量衡单位词”“部分词”和“范词”三个次类,“范词”所指与今天西方语言学文献中的狭义的“数量类别词(*Numeral Classifier*)”同,见下。

classifiers 一词,有“类词”“类别词”“分类词”等不同的译名,本书取“类别词”。就文献中对 *classifiers* 一词的使用来看,其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

先来看跟汉语有关的一些研究中 *classifiers* 一词的使用情况。

在不少研究中,人们用“类别词(*classifiers*)”来对译汉语的“量词”。T'sou(1976)用[±个体(*entity*)]和[±精确(*exactness*)]两个语义特征把现代汉语的量词分为四类:[+精确, +个体],如“一只鸡”的“只”;[+精确; 一个体],如“一斤鸡肉”的“斤”;[-精确; +个体],如“一群鸡”的“群”;[-精确; 一个体],如“一种鸡”的“种”。该文认为,类别词,几乎每种语言都有,但是每一种的数量是不一样的。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对于[+精确, +个体]没有外在的标记,但是该特征在亚洲语言中却需要丰富而复杂的类别词系统来体现。对此,该文说:“本文通过对名词类别词的研究想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即在自然语言中,名词类别词的使用和复数形态的使用是互补的。具体一点说:a. 一种自然语言或者具有名词类别词,或者具有复数形态;b. 如果一种语言这二者都有,那么它们的使用是互补分布的。”^①Lyons(1977: 462)也指出,英语和所谓的类别词语言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英语等印欧语言的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之间有语法上的区分。

有时候,“类别词”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 Cheng & Sybesma(2005)就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宽泛地使用‘类别词(*classifiers*)’这个术语,作为一个术语,它涵盖两个类型,一般称之为‘类别词(*classifiers*)’和‘量度词(*measure words*)’。”^②狭义的“类别词”大致相当于 T'sou(1976)的[+精

① 本书对直接引用的外文文献采用如下处理方式:在正文中给出我们对原文的翻译,在脚注中给出原文,以便读者核查和理解;下同。“Moreover, the study of nominal classifier systems suggests an important hypothesis that the use of nominal classifiers and the use of the plural morpheme are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More concretely, it suggests that either a) a natural language has either nominal classifiers or plural morphemes, or b) if a natural language has both kinds of morphemes, then their use is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② “So far we have been using the term ‘classifier’ loosely, as a cover term for two types of elements, traditionally referred to as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确,十个体]这一类。T'sou(1976)的[+精确;一个体]一类也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量度词”。为了区分广义的“类别词”和狭义的“类别词”,人们又把狭义的称为“专用类别词(sortal classifiers)”,见下。

在一些研究名词及其形态与分类的类型学文献中,classifiers 一词的使用和理解更为分歧,也最为宽泛。Corbett(2007:254)在谈到这一情况时说:“需要指出的是,在文献中,术语的使用是混乱的:一位作者的类别词系统,在另一位作者那里,可能就是一个名词类系统。”^①

下面来看 Allan、Bisang 和 Aikhenvald 这三位学者对类别词的分类与相关研究。

Allan(1977)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超过 55 种具有类别词之语言的研究,依据类别词的句法表现,把类别词分为四类。这四类类别词与其例句及其简要说明,我们列表如下(类别词用加粗的方式显示):

数量类别词 (Numeral Classifier)	khru · lâ · j khon “teacher three person”= “three teachers” (该例取自泰语,是“三位老师”的意思)
一致类别词 (Concordial Classifier)	ba -sika ba -ntu bo -bile “ba + have + arrived ba + man ba + two”= “Two men have arrived” (该例取自汤加的班图语,ba-是复数人类类别词,该例的意思是:两个人已经来了。)
述谓类别词 (Predicate Classifier)	1. béésò sì-ʔá “money perfect-lie (of round entity)”= “A coin is lying(there).”(那儿有一枚硬币。) 2. béésò sì-nìl “money perfect-lie (of collection)”= “Some money(small change) is lying(there).”(那儿有一些零钱。) 3. béésò sì-ltsòòz “money perfect-lie (of flat flexible entity)”= “A note(bill) is lying(there).”(那儿有一张钞票。) (这三个例子取自美洲印第安 Navajo 语,最后一个成分为类别词,表示事物的某种可以识别的特征。)
内-处所类别词 (Intra-locative Classifier)	如澳洲东北部的 Dyirbal 就有四个类别词(其中一个为零形式),后缀于处所语素,分别表示“可见-这里”“可见-那里”和“不在视域之内”等意义。

Allan(1977)提出了定义类别词的两个标准:一是在具体的条件下,类别词作为语素出现于表层结构;二是类别词有意义,也就是说,一个类别词指示了与其组配之名词所指事物的某个凸显的感知特征或者评价(imputed)特征。综而观之,类别词分类所依据的语义范畴一共有七个,每个范畴

①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erms are used in confusing ways in the literature; what is a classifier system for one author would be a noun-class system for another.”